



教科书研究丛书

丛书主编 石鸥

清末民国中小学英语教科书研究

吴驰 著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清末民国中小学英语教科书研究”(DAA110179)研究成果

◆湖南师范大学博士科研启动项目“中国近代中小学英语教科书研究”(2013BQ29)研究成果

◆湖南师范大学博士出版基金资助



清末民国中小学英语教科书研究

吴 驰 著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清末民国中小学英语教科书研究/吴驰著.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5

ISBN 978 - 7 - 5648 - 1619 - 3

I. ①清… II. ①吴… III. ①英语课—中小学—教材—研究—中国—清后期
②英语课—中小学—教材—研究—中国—民国 IV. ①G633.4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73750 号



教科书研究丛书

丛书主编 石鸥

清末民国中小学英语教科书研究

吴 驰 著

策划组稿 | 赵亚梅

责任编辑 | 胡成玲 廖小刚

责任校对 | 首智慧

出版发行 |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址: 长沙市岳麓山 邮编: 410081

电话: 0731. 88853867 88872751

传真: 0731. 88872636

网址: <http://press.hunnu.edu.cn>

经 销 |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 mm × 1092 mm 1/16

印 张 | 15 插页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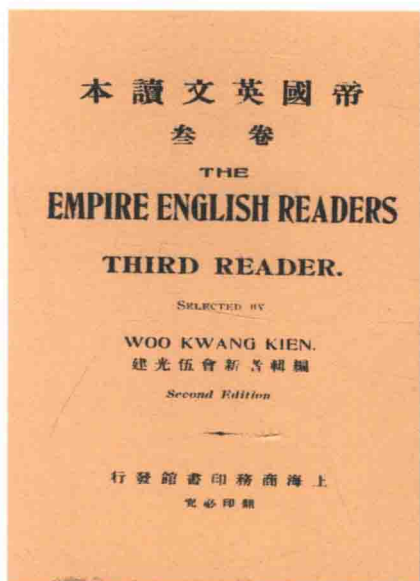
字 数 | 248 千字

版 次 | 2014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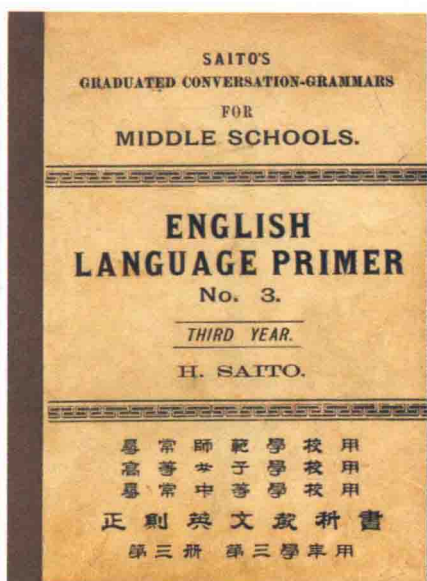
书 号 | 978 - 7 - 5648 - 1619 - 3

定 价 | 45.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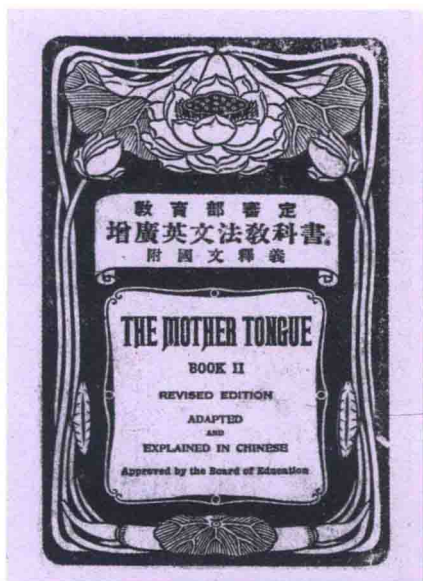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转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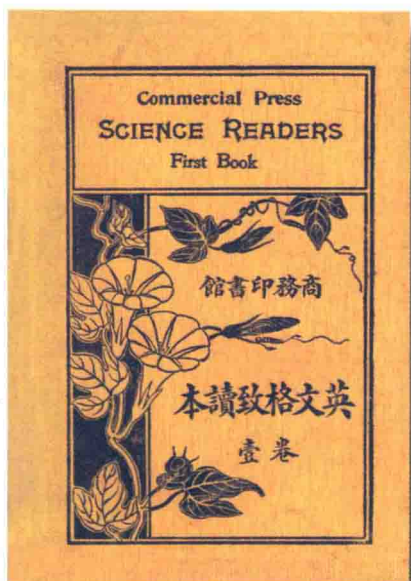
▲帝国英文读本，商务印书馆，19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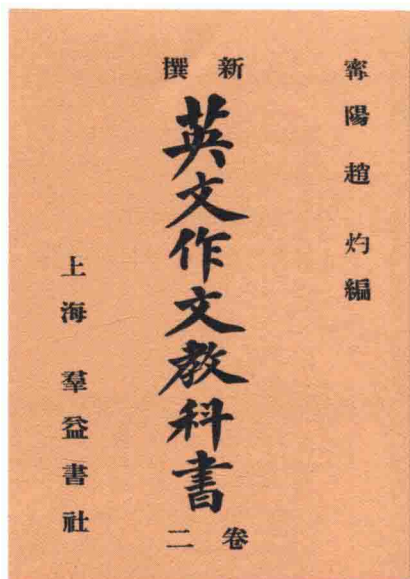
▲正则英文教科书，湖北中学教科书社，19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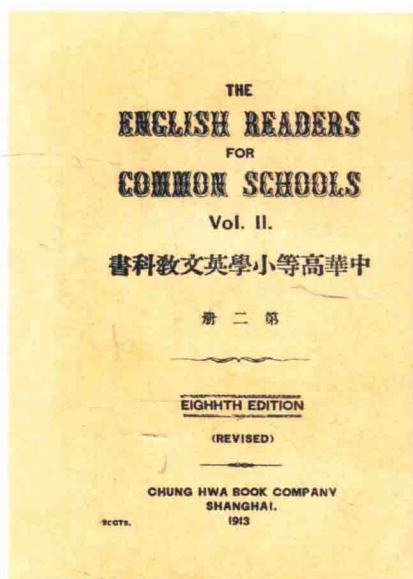
▲增广英文法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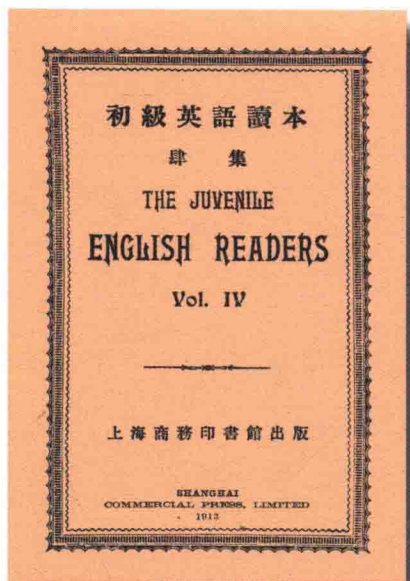
▲英文格致读本，商务印书馆，19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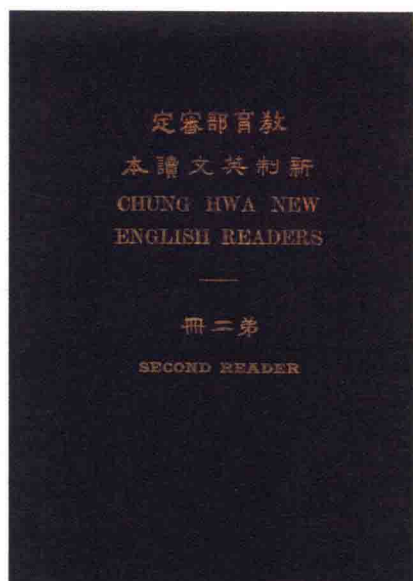
▲英文作文教科书，群益书社，19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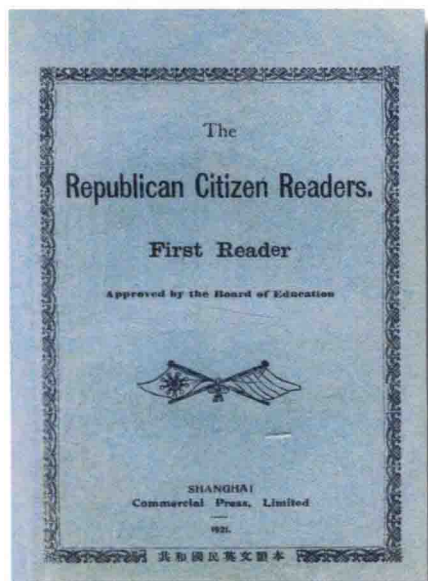
▲中华高等小学英文教科书，中华书局，19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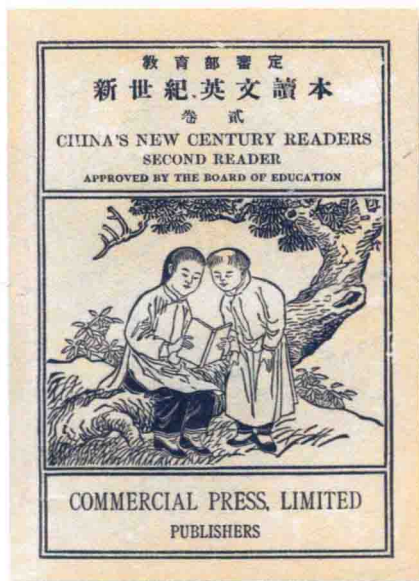
▲初级英语读本，商务印书馆，19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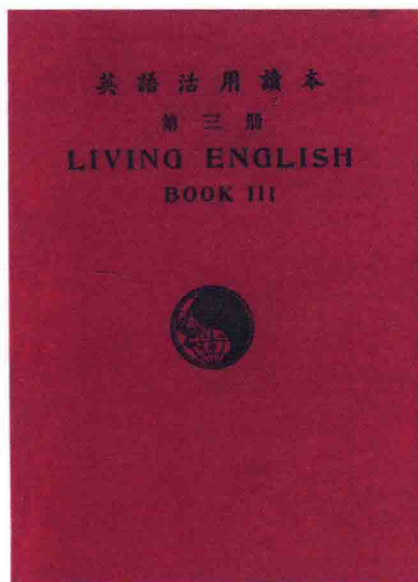
▲新制英文读本，中华书局，1921



▲共和国民英文读本，商务印书馆，19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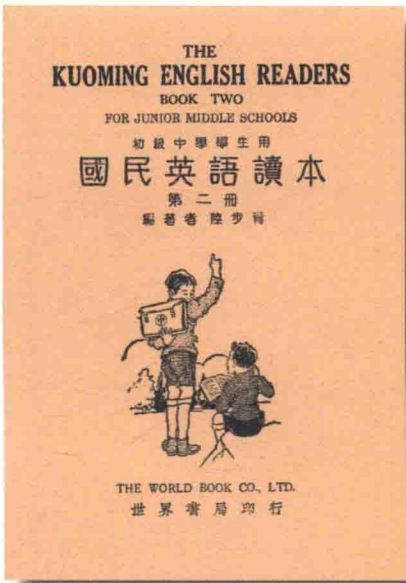
▲新世纪英文读本，商务印书馆，19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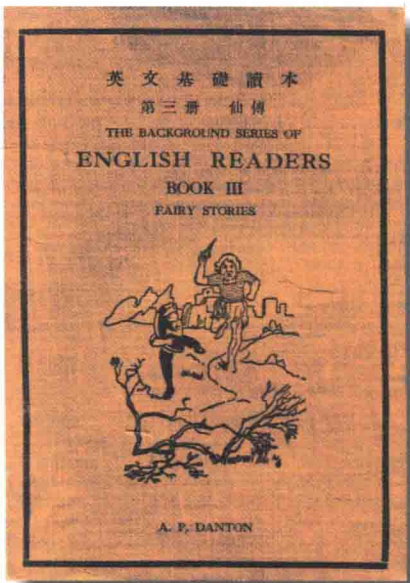
▲英语活用读本，商务印书馆，1928



▲开明第二英文读本，开明书店，1928



▲国民英语读本，世界书局，19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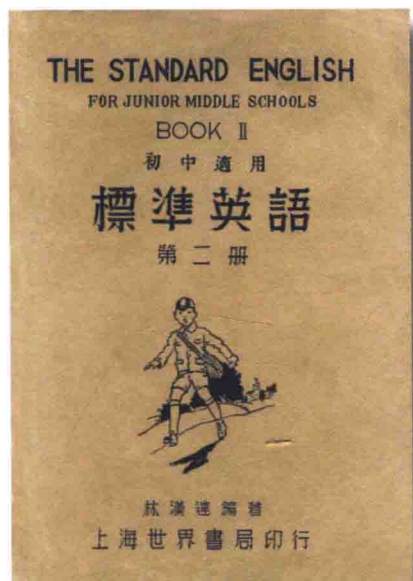
▲英文基础读本，商务印书馆，19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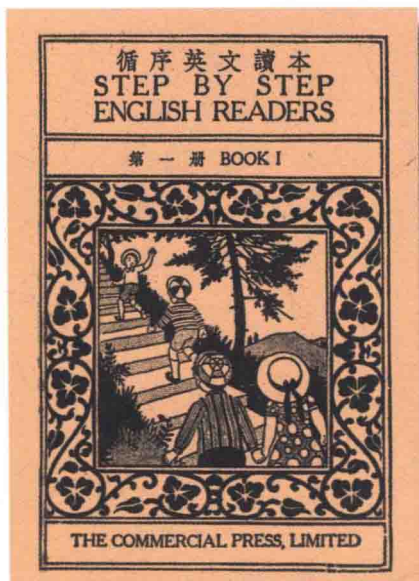
▲新生英语课本，上海新生书局，1935



▲最新英文读本，中华书局，19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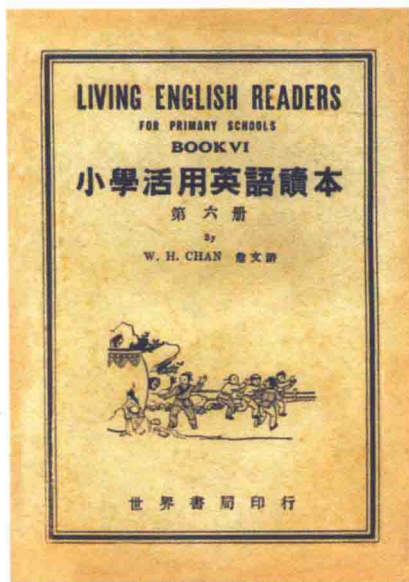
▲标准英语，世界书局，1937



▲循序英文读本，商务印书馆，1940



▲大众英语读本，大众书局，1940



▲小学活用英语读本，世界书局，19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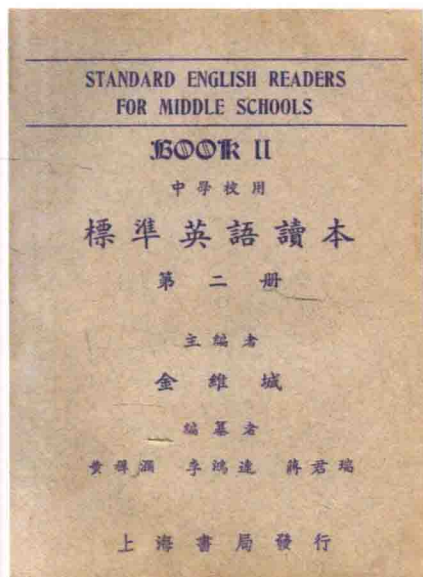


0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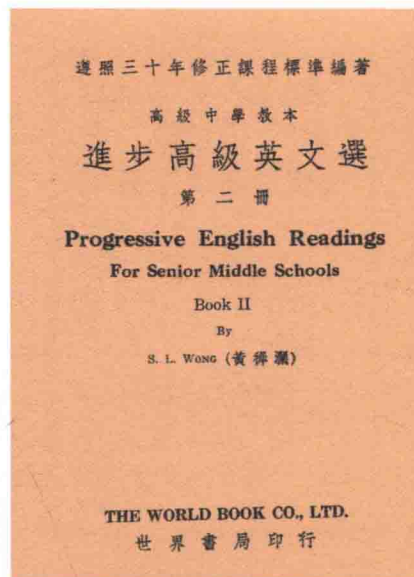
教科书研究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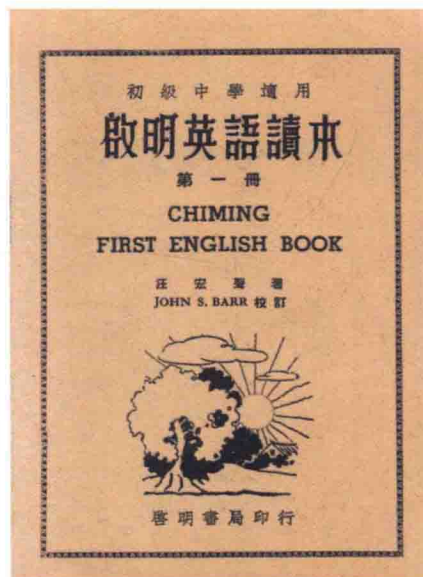
▲高中英语读本，中华书局，1941



▲标准英语读本，上海书局，1945



▲进步高级英文选，世界书局，1947



▲启明英语读本，启明书局，1948



序

与高头讲章、学术典籍相比，孩童们手捧的小课本似乎是最微不足道的了；与研究国家的宏观教育战略及纯学理体系的构建相比，对这些小课本的研究似乎也是最微不足道的了。

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一切学术精华与思想光芒，只有被一代代年轻人吸收同化进而创新，才有可能学术长存，思想长春，而要让它们成为年轻人成长的营养，需要化为简单浅显的内容融入课本，才可能融于心灵。一切教育战略的实施和各种教育学派的主张，最终必须进入学校，进入课堂才有价值与意义，而进入学校、进入课堂的途径主要是这些小课本。任课程理念多么先进，任教育思想多么进步，唯有转化为课本才可能起应有作用；任人的全面发展的目的如何清晰，任民族素养的提升需求多么急迫，也唯有借助课本才能得以不同程度的实现。

历史地看，中国自洋务运动一百多年来，从西式教科书的引进，到学堂自编教科书发轫；从书坊教科书之兴盛，到官编教科书的出现；从通用教科书的一统，到教科书的百花齐放，小小课本开民智启民德，传承着民族的光荣与梦想，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撒播着现代文明之光，它们启迪心灵，形塑国民，激荡着中国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特别是 20 世纪的前半个世纪，在“盗贼夜行，军阀逐鹿的民国年间，多处乡镇仍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为什么？纵然是兵荒马乱，却有人心淡定。这又是为什么？有人说，这是因为上有信念、下有常识，而集二者于一身的乃小小课本；这是因为“民间社会的许多路口站着有严肃的先生、学童，手中握着课本”（邓康延语）。这就是教科书的力量。

曲折微妙的是，在中国文化下，教科书开创并主导中小学的局面在 20 世纪后半半个世纪愈加真实、持久并且极端，功利化色彩日益



浓厚。教师的优劣以学生对教科书的掌握为标准，教育的质量以考核学生掌握教科书的情况为依据，家长对孩子的督促也是手捧着教科书来检验。我国的文化传统导致了学校课堂上教师教的是教科书，学生学的是教科书，考试考的是教科书——从古至今，从古代科举到现代学校概莫能外。教科书在我国中小学几乎就是教育的圣经。中小学的课堂文化几乎就是教科书的文化。我曾经说过，一定程度上指挥中国中小学教育的不是教育部，而是编撰教科书的那些人。他们指挥着学生学习什么接受什么，他们告诉学生认同什么否定什么。他们让整个中小学课堂随教科书的定调起舞。

遗憾的是，长时期里，对于这些小小的于个人于民族都意义非凡的教科书，我们的学术界特别是经典学院派的学术几乎对其不屑一顾。这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新中国以后著名学者亲自实质性操持教科书的现象越来越少，二是对教科书的真正研究非常匮乏。课本圈（姑且这么称谓）往往是自说自话，基层实践工作者看重教科书的教与学，教科书提供者看重课本的编撰与发行，唯独缺乏极为重要的对教科书的批评或评论。最重要的文本，竟然缺乏最需要的关注。

教科书如此重要，而我们却无法科学回答教科书中究竟是否应该编入金庸的武侠小说，是否可以删掉《狼牙山五壮士》；面对充满争议的鲁迅的作品哪些以及多少甚至是否应该进入教科书，我们莫衷一是；对教科书究竟是否应该或如何体现国家意志，当国家意志与客观真理冲突时教科书应如何处置等问题，我们充满困惑；对教科书如何体现特色，教科书发展进程中统一与多样、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之间如何权衡人们普遍不解……无法回答是因为缺乏研究，莫衷一是也是因为缺乏研究，充满困惑还是因为缺乏研究，普遍不解更是因为缺乏研究。

别无解决之途，唯有加强研究。我们太需要研究了，需要教科书批评或评论。

此时，俯看自身，回望历史，廓清历史就是一种研究。19 世纪下半叶始，有了新式学堂，也有了新式教科书。一百年来，中国的教科书发展走出了一条值得大书特书之路，这条道路之艰辛、之曲折、之困顿，需要梳理，需要总结，更需要反思。以史为鉴，可知兴替。我们提出，清末民初教科书发展有一个绝无仅有的黄金时期，那么，这与紧接着的人才辈出、群星璀璨的局面有没有必然的联系？大事件、大人物、大著作、大思想固然重要，小课本引进新思想、新行为、新价值观的作用也不能轻视。它们为大人物的新思想、



为大事件带来的大变革，提供了思想基础和觉醒的民众基础——清末民初的海量教科书掀起了中国历史上最草根的一次重要的民主政治启蒙、现代伦理启蒙、科学文明启蒙运动，这场启蒙运动自下而上展开，为推进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做出了贡献。在一定意义上，辛亥革命的枪炮声之所以相对比较容易攻破延续千百年的封建皇朝，是由于这场启蒙；五四运动民主与科学的理念之所以很快就成为广大学生积极追求的理想，胡适、鲁迅、陈独秀的思想之所以被广大青年普遍认同，都是由于这场启蒙。

教科书研究不仅要回望过去，更重要的是检视当下，启迪未来。今日，当我们痛陈教科书问题多多，批判教科书远离儿童，脱离生活之时，我们能否从那些历史久远的教科书和已经成为过去的早期教科书制度中获得些许启示？为什么百年前鲜活的教科书至今天成为教条、说教、枯燥、死气沉沉的代名词？当年张之洞、蔡元培、胡适、陈独秀、章士钊、冯友兰、吕思勉、顾颉刚、林语堂、竺可桢、严济慈、丁文江、刘海粟等亲自甚至独立编撰教科书的局面何时才能再现？是否值得呼唤再现？确实，历史与现实有着惊人的统一，一百年后，我们仍然要不停地追问：中小学教科书如何体现科学、民主、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与追求？如何利用教科书这一最大读者群的文本对未成年人进行有效思想引领？如何通过教科书给广大青少年儿童以及他们的家长带来更多的正能量？这些一脉相承的现实问题，我们也许可以从历史这面镜子中得以昭示和折射。

教科书研究还要探寻本真。历史永远纷繁复杂，现实总是变幻莫测，这尤其需要加强对教科书本真问题的探究。比如：教科书有哪些构成要素，教科书的基本特征是什么，教科书的质量标准和评价体系是什么样的，如何编写既体现一般文化要求和知识水准、又能够满足不同发展水平的学生需要的教科书，社会（国家）、学科、学生三要素在教科书编写中的地位与价值，教科书选择内容的依据以及教科书内容的更新和改编，教科书的竞争、选用和淘汰制度等主题的研究。

该套丛书即是由我领衔的教科书研究团队在教科书研究的上述方面所做的些许努力和尝试。这些研究风格不一，主题不一，但都是围绕教科书而展开的，既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既有学科的也有制度的。它们或从教科书历史维度来展开，如对清末民国、对新中国十七年等不同历史时期的教科书的历时性、阶段性研究；或从现实角度展开研究，如教科书内容取舍过程中的各种权力博弈，教科书对思想的形塑和规训等；或围绕学科教科书展开研究，



如对英语、对体育、对思想品德等教科书的梳理与研究；或从制度维度来研究，如教科书的审定。但都试图通过实物澄清史实，通过历史昭示现实，通过各个点的深挖来实现面的通透，通过教科书的外在表现来把握其深层实质，通过教科书这面镜子来透视教育发展、折射孩子们的成长。其中有些研究即便粗糙，应该说还是填补空白的；有些研究的结论即便还值得商榷，但某些方面是值得充分肯定的，比如对清末民国教科书的审定制度研究，其文献梳理工作相当扎实，至少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比较可靠的文献基础。所有研究都体现了一个突出特点，即大量占有教科书实物。我们主张，在教科书研究上，不读课本不动笔，至少慎动笔，犹如文学评论要读文学作品、电影评论要看电影一样。我很庆幸，研究教科书我们有一种天然优势，这就是大量占有历代教科书。

该套丛书与其说是某个人的研究成就，不如说是我们教科书研究团队集体智慧的结晶；与其说是教科书研究团队近年的研究成果，不如说是十多年潜心搜集、整理、分类、研究的成果积累（其中多数是毕业多年的博士对自己论文的修改稿）；与其说是研究的结果展示，不如说是我们团队有关教科书研究的新的、深度的开始。

该套丛书的出版首先要感谢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没有周玉波先生、陈宏平先生的眼光与气度，没有李培超先生、黄林先生、何海龙先生、曹爱莲女士的认真审读以及各种宝贵意见，没有赵亚梅女士的策划组稿及文字加工等辛勤劳动，就不可能有这套书的面世，由衷地谢谢各位。说真的，我欣赏并信赖用心在做我们的书的出版社。

该套丛书的出版还要感谢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感谢孟繁华教授，感谢宁虹、康丽颖、蔡春、张增田教授，感谢关心我的各位同事。感谢你们为我的研究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平台。

本丛书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二五”规划2012年度教育学课题“百年中国教科书在文化传承与创新中的基础作用”（BAA120011）阶段性成果。

石鸥

于首都师范大学 学堂书斋

2013年8月25日



前言

教科书不仅复活了古老的文化，而且回响着时代的声音。它浓缩了整个中华文明史，寄托着中华民族一直苦苦追求的全部梦想。

——石鸥《百年中国教科书图说（1897—1949）》

随着社会不断发展，全球化进程不断加速，经济、文化日益融合，不同国家的人们需要用一种被国际大部分地区所认同的语言作为交流与沟通的工具，而英语这门被国际公认的主流交际语言当仁不让地担当起这份重任。因此，英语作为一门不同于汉语的“舶来品”越来越受到国人的重视，如何学好英语，如何运用英语也成了学者与大众日益关心的问题。而英语教科书作为英语语言教学的载体却被大家忽略，失去其应有的重视，“最不该忽视的文本，却最少被研究，最不该忽视的研究被忽视了。”^①

—

20 世纪初期，腐朽的清王朝在西方的枪炮下不堪一击，紧锁的国门被殖民者打开。由此，中国近代英语教育和英语课程逐渐走入历史的舞台，从而拉开我国近代英语教科书的序幕。

我国最早的英语教学来自于西方在中国开设的教会学校。中国正式的英语教学开始于京师同文馆。但早在同文馆之前的几十年，中国的沿海城市已有了英语教学。第一个来中国传教的基督教传教士是英国的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② 他于 1818 年在马六甲设立了一所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该校以宣传基督教而学习英文和中文为目的。1834 年在马礼逊

① 石鸥. 最不该忽视的研究——关于教科书研究的几点思考 [J].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 2007 (5): 6.

② 李良佑, 张日晟, 刘梨. 中国英语教学史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8: 1.



去世后，在广州和香港的一批传教士于1835年发起成立了马礼逊教育协会（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同时筹办马礼逊纪念学校。^①

这所学校的办学目的则在该会发起的“通报”中有明确指示：“本教育会的宗旨是在中国开办和资助学校，在这些学校里除教授中国少年读中文外，还要教授他们读写英文，并通过这个媒介，把西方世界的各种知识送到他们手中。这些学校要读《圣经》和有关基督教的书籍……”^②

马礼逊教育协会对学校所用教材也有明确规定，“学校课本，乃以读本、作文、数学、地理及其他科学教导学生，并以英语、华语讲授，以收效果。”^③早期的英语教科书基本上都是来自西方的原版教材或由英美的传教士所编写的读本。其中较有名的有英国的罗卜丹（Robert），他于1843年编写了《汉英词汇》（Chinese and English Vocabulary），1846年又编写了《汉英会话》（The Chinese Speaker）。美国人裨治文等人于1847年开始从事《圣经》的翻译工作。英国的麦都思于1848年编写了《英汉字典》和《汉英字典》。1852年，英国的斯特罗纳奇（J. Stronoch）等人发表了《旧约》的中文译本。1858年，英国的霍布森（B. Hobson）编写成《英汉医学词汇》。这些书籍是早期编著、出版的第一批汉英读物。^④

而中国自编英语教科书的产生与当时社会变革戚戚相关。当“天朝大国”的神话被西方的军舰和大炮毫不留情地打破后，满清政府被迫向西方学习以维护自己岌岌可危的统治。而此时的语言不通便成了当时最大的障碍。清廷奕訢在《通筹善后章程折》中写道：“今语言不通，文字难辨，一切隔膜，安望其能妥协！”^⑤冯桂芬在《采西学议》中也谈到，“且也通市二十年来，彼酋之习我语言文字者甚多，其尤者能读我经史，于我朝章、史治、舆地、民情，类能言之；而我都护以下之于彼国则懵然无知，相形之下，能无愧乎？”^⑥因此，培养实用的外语人才迫在眉睫，如何实施外语教学成为当务之

① 李良佑，张日晟，刘梨．中国英语教学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8：3．

②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40．

③ 李良佑，张日晟，刘梨．中国英语教学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8：4．

④ 李良佑，张日晟，刘梨．中国英语教学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8：4．

⑤ 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121．

⑥ 高时良．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4．



急，而使用何种英语教科书则成为重中之重。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关注与努力下，少数知识精英群体接过了编撰英语教科书的重任，担负起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夏瑞芳和鲍咸恩、鲍咸昌兄弟及高凤池等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创办了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后来成为了近代中国出版机构中的“巨型航空母舰”，大量自编英语教科书出自于此。中国最早自编英语教科书是商务印书馆于1898年出版的《华英初阶》和《华英进阶》。这套书出版后风行一时，影响甚大。

中国英语教科书产生于特定历史条件下，不仅仅是语言的载体，而且也引领社会的发展。它通过传播语言知识，改变了国人拒绝西方先进文明的观念，使欧美现代知识在中国迅速传播开来，对于人们开拓视野、宣传平等观念、普及民主意识、推动妇女解放运动都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可以这样说，中西交流促使国人逐渐尝试英语，而西方教会学校则把英语正式传入我国。在今天的中国，英语已成为最重要的外语之一，英语教科书在这一演变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信息不发达的清末、民国时期，它作为新式学堂教学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英语课程实施的主要载体，它对我国英语教学的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二

教科书，英语一般用“Textbook”一词表示。因为教科书一词具有丰富的含义，所以关于教科书概念的界定也层出不穷。《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把教科书定义为“根据教学大纲（或课程标准）编订的、系统地反映学科内容的教学用书。”^①在《现代汉语词典》一书中，把教科书概念归纳为“专门编写的为学生上课和复习用的书。”^②在《辞海·教育心理分册》一书中，教科书又被认定为“按照教学大纲编选的教学用书。”^③而《美国大百科全书》将教科书定义为“是为了学习的目的通过编制加工并通常用简化方法介绍主要知识的书。”^④

① 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部. 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 [M].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76: 145.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部. 现代汉语词典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3: 571.

③ 上海辞书编辑部. 辞海·教育心理分册 [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5: 5.

④ 周士林. 世界教科书概况 [J]. 教材通讯, 1985 (6): 12.



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教科书概念进行界定，得出了各种定义。前苏联学者巴拉诺夫认为，“教科书是最重要的教学手段，是教学过程中不可缺少的最重要的教学手段，是根据教学大纲并考虑学生掌握知识在年龄上的可能性规定教材的内容。”^①德国学者施穆克（E. Schmucker）认为，“教科书是学校的教育工作者根据各州教学大纲，从一定的教育观念出发为学生提供个别学科活动素材的辅助手段。”^②美国学者戈温（Gowin）认为，“教科书是作为教育工具的‘书’，其特性是：作为好的思维情感的媒介；作为具有潜能可促进新事件发生的过去事件的记录；作为思想或过程的权威记录；作为概念或知识（信息）实体的编制者；作为增加意义和丰富经历的刺激物。”^③

一般认为，教科书可以分为广义教科书和狭义教科书。广义上的教科书一般是指能够给师生提供有关教学信息和方法的基本材料，简而言之是指为教学而编制的一切材料；而狭义上的教科书是指按照课程标准或教学大纲进行编写的教科书，它能够最大限度地体现课程标准或教学大纲所要求掌握的课程知识，能够根据不同年级进行课程安排，并配有教学指导用书等供教学使用的材料。

“教科书”与“课本”在很长一段时间被认为是意思对等的一组词，但是实际上，两者出现的时间不同。“课本”一词由“课”与“本”两字组成，“凡定有程式而实验稽核之，皆曰课”，“凡事之根源为本”。“课本，即是功课的根源或学校教学过程的根源之意。”^④从历史上看，“课本”一词先于“教科书”一词出现，在俗语和泛称中广泛使用；而教科书一词在清末出现后，课本与教科书概念的使用呈现出并行同一的趋势。

与之相似的还有另外一组概念：“教科书”与“教材”。这两个概念在使用上经常被互相替换，但是两者在外延方面并不相等。“教材”概念在教育史上定义众多，以《中国大百科·教育卷》一书中的定义为例：“（1）根据一定学科任务，编选和组织具有一定范围和深度的知识技能体系，一般以教科

① [苏]巴拉诺夫，等．教育学[M]．李子卓，等，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6：140.

② 钟启泉．现代课程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9：691-692.

③ 胡森．简明国际教育百科全书·课程[M]．江山野，等，编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1：129.

④ 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编辑部．辞源（改编本）[M]．香港：商务印书馆，1951：735.